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

世界贫困的挑战

世界反贫困大纲

[瑞典] 冈纳·缪尔达尔 著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

世界贫困的挑战

——世界反贫困大纲

[瑞典] 冈纳·缪尔达尔

顾朝阳 张海红 译
高晓宇 叶立新

顾朝阳 校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1·北京

(京)新登字211号

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verty
A World Anti-Poverty Program in Outline
by Gunnar Myrdal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世界贫困的挑战

SHIJI PINKUO DE TIAOZHAN

〔瑞典〕缪尔达尔 著

顾 朝 阳 等译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

北京市通县永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75印张 369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5000

ISBN7-5638-0288-6/F·168

定价: 6.40元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

编 辑 委 员 会

顾问	厉以宁	宋承先	张培刚	胡代光
	钱荣堃	高鸿业	黄范章	谭崇台
主编	贾 湛	梁小民		
编委	于同申	厉以平	何宝玉	李玉臣
	吴珠华	吴衡康	杨仲伟	杨德明
	宋慧毅	邹 蓝	范恒山	冼国明
	俞品根	施 炜	顾 昕	舒 元
	薛进军	薛 捷		

GDC15/37-14

编者献词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介绍了不少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对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了使这种介绍更具有全面性和代表性，我们决定系统地翻译出版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的主要著作，作为翻译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本丛书从1988年开始陆续出版。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奖。它是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在其建立300周年时为纪念诺贝尔奖金提供者而设立的基金，全称是“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委任组成的“经济科学委员会”评定。从1969年起在每年的10月中旬与其他各项诺贝尔奖同时公布，到1987年为止已颁发19届，共有欧美的25位经济学家获奖。获奖的经济学家们的经济理论基本上代表了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成就，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读者通过这些著作能全面、深入、系统地了解和研究西方经济学，从中吸取对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发展有价值的东西。

当代西方经济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数学方法的应用。经济学要反映经济中的数量关系，因此，经济学与数学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7世纪起经济学家就用数学公式来表述经济理论。本世纪以后经济学家又把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结合起来建立了经济计量学，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学的数学化是经济学精密化、实用化的标志。在获奖的经济学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在这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获得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挪威经济学家R·费瑞希和荷兰经

济学家J·丁伯根是经济计量学的创立者。以后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逊、K·阿罗、W·里昂惕夫、P·库普曼、L·克莱因、G·德布齐、英国经济学家J·希克斯、苏联经济学家L·康托洛维奇都在经济学数学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流派林立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新古典综合派是公认的“主流派”。这一派继承并发展了凯恩斯主义，对西方各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都有重大的影响。因此，在获奖的经济学家中属于这一派的有相当比例，如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逊、L·克莱因、J·托宾、F·莫迪利亚尼、R·索洛，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70年代后西方经济政策与经济理论的显著变化是自由主义的影响日益增强。代表自由主义的奥地利经济学家F·哈耶克、美国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G·斯蒂格勒、J·布坎南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便反映了这种趋势。

经济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科学。因此，获奖者中还有一批对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如：美国经济学家S·库兹涅茨和英国经济学家R·斯通对国民收入统计作出开创性贡献；美国经济学家A·刘易斯和T·舒尔茨对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有独特贡献；瑞典经济学家B·奥林和英国经济学家J·米德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关系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经济学家H·西蒙对管理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本丛书的选编以获奖者的代表作，特别是在西方经济中影响重大的名著以及对我国经济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启发和借鉴的著作为主，每位获奖者的著作至少选一本，以保持其系统性与代表性。

还应该说明的是，西方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获奖的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学者，因而在这些著作中必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阅读时我们应注意这一点。但是，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之一，有其不可忽视的精华，资产阶级学者对经

济问题的研究有其可取之处。从这种意义上说，只要我们以分析的态度认真阅读这些著作，必将得到许多有益的收获。

本丛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老一代学者与中青年学者的关心与帮助，谨向关心与帮助这套丛书编辑出版工作的所有朋友表示感谢。

编 委 会

1988年4月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冈纳·缪尔达尔 (Gunnar Myrdal, 1898—) 为著名瑞典经济学家, 1974年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Friedrich Hayek) 一起, 由于“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上的开创性著作”, 同时还由于“对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的精辟分析”而共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缪尔达尔1927年获斯德哥尔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33年成为该校政治经济学和财政学教授。在学术生活之外, 缪尔达尔还活跃于政界, 曾两度当选为瑞典参议员, 担任过商务部长和战时计划委员会主席, 并长期担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自1957年起, 他对南亚和东南亚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本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该研究的成果。1961年他回到斯德哥尔摩大学任国际经济学教授, 并为该校筹建了国际经济研究所。

缪尔达尔的经济学研究可以明显分为两个时期: 早期作为瑞典学派的创建人之一, 致力于货币均衡理论和经济波动理论方面的研究, 特别是用动态分析方法研究货币均衡理论问题; 自40年代起转向制度经济学研究, 成为新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 着重从社会平等角度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本书即其后期的代表作之一。

缪尔达尔于1968年出版了三卷本巨著《亚洲的戏剧: 对一些国家的贫困的研究》, 对南亚的不发达国家状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本书则为《亚洲的戏剧》之续篇, 在分析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性结论和建议。本书可以使读者对缪尔达尔有关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思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本书的译校分工情况如下：第五、六、八、十章由张海红译，第四、十一章分别由高晓宇和叶立新译，其余部分由顾朝阳译，并由顾朝阳对全书做了统一校订。另外李冲力、何宏生参加了部分翻译工作。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1990年12月

序 言

1964年冬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学术研究院决定设立克里斯琴·A·赫脱系列讲座，以向这位大约20年前创建这所学院的杰出的美国人聊表敬意。院方希望，资深学者可利用在我们国家首都的这个讲坛提出有关国际关系的不同观点，深刻探讨美国在一个剧变的世界里所遇到的一些基本问题。

1969年，院方为系列讲座邀请了著名的瑞典学者和官员冈纳·缪尔达尔博士。他刚刚出版了他的里程碑式的三卷本著作《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的贫困的研究》。缪尔达尔博士怀着他的讲座也许会成为《亚洲的戏剧》姊妹篇的想法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因此，1969年3月他在高级国际学术研究院以“富国与穷国：70年代的发展战略”为总题目做了三次讲座。

本书就是这些讲座的直接产物。正如题目所示，基本主题仍然不变，但论述了若干新的课题，在原有讲座基础上增加了许多新材料。其结果是一本有关政策性结论的书，它同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密切相关。

随着我们进入70年代，有两个巨大的问题超出了所有其它的问题：一、世界如何才能避免可能导致全面核战争的那种冲突；二、我们应怎样利用世界资源，从而使人类能够接受贫困的迫在眉睫的挑战，并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不幸的事实是，我们在这两个前沿问题上都还没有太多的进展。在经济方面谈得很多，但并没有足够的用于发展的资本和足够有效的行动。10年前联合国宣布60年代为“发展的10年”。在中间几年里，新兴国家中发展的势头显著减弱，西方国家越来越

不愿提供对外援助。

为了扭转这两个令人沮丧的趋势，联合国已宣布70年代为“第二个发展的10年”。第二次伟大的征程会不会比第一次更为成功，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但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在此历史的特殊时刻，当人们做出每一分努力从过去的错误中得出教训时，冈纳·缪尔达尔充满智慧的著作会受到发展领域内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欢迎。

经再思之后，我想他的建议尽管有益，也未必就受欢迎，因为他尖锐地提醒西方援助国与新兴国家双方，如果要实现世界的发展目标，两者都要做出进一步的巨大努力。他没有低估外援的必要性，但他确实反复地强调，发展中国家自己必须做到多少，雷厉风行地去做又是多么迫切。他写道，发达国家的援助“尽管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也只是使不发达国家的加速发展成为可能所需要的工作的一小部分。比这援助重要得多的是这些国家自身所需的社会和经济改革。”

缪尔达尔博士以他的洞察力和远见理所当然地赢得了世界声誉。1944年在《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一书中，他准确地预言了这个国家60年代在种族关系方面遇到的许多困难和问题。那本书至少超前于时代15年。本书也许超出时代同样久远。就个人而言，我觉得他对世界疾患的诊断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他开出的药方可能要到贫困和富裕国家两者的传统、骄傲、偏见与实践被足够的时间改变之后才能证明是可以接受的。即使如此，世界也会认真地思考从他多年的实践经验和精心研究中提炼出来的思想。

确实，我想不出还有谁比冈纳·缪尔达尔能更好地承当这种政策的研究了。当我第一次认识他时，他是一个国际组织的文官，正满怀职业允许的所有想象力和热情负责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年轻时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法律和经济，34岁

时他成为那里的政治经济学和财政学教授，后来他当了商务部长和瑞典参议院的议员。有了这个背景，他能够令人叹服地跨越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鸿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明天的世界提供有意义的建议。

在评价未来的前景时，作者小心地避免了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危险陷阱，他既不是波利安娜^①也不是卡桑德拉^②。正如他在本书较前的一章中指出的：“乐观主义同悲观主义一样，只意味着一种偏见的观点。”因此，学者所追求的“是现实主义，哪怕他因此与自己职业内流行的观点相冲突。”

这当然是一个睿智的忠告，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民主里尤其睿智。我们的民主中行政机构易于为了赢得议会的批准而过分吹嘘对外援助之类的计划。通常，对成功可能性的坦诚评价还不够。外援的优点被突出出来，而对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却轻描淡写。实际结果是，成就往往同预期相去甚远，信用差距因之产生，一些议员对外援的幻想破灭。在这种情形下，过分乐观的方法泛滥所造成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外援和经济发展充满了复杂性和问题，我们要想达到成功的彼岸就必须清楚地懂得这些问题。

无论怎样，我们都会同意，随着70年代的到来，世界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所需要的无疑是两个响应：一、对新兴国家的问题更多的关心和富国为了共同的事业做出实质性牺牲的强烈愿望；二、发展中国家对推行意义深远、对于真正进步必不可少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强烈愿望。我希望本书将有助于双方比现在更清楚地理解他们相互关联的责任的实质。

①美国作家E·H·波特所著小说中的人名，指遇事过分乐观的人——译注。

②希腊神话中的悲观女神，为特洛伊国王之女，能预知祸事——译注。

弗朗西斯·O·威尔科克斯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学术研究院院长

一九六九年七月四日
于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前 言

当我原先筹划一部早期著作《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的贫困的研究》（纽约：20世纪基金会和潘森图书公司，1968年）时，我觉得应以有关政策的一节来结尾。确实，由于我总是不离开明确的价值观前提，在此即现代化的理想，在若干章节里我可以从我认为已建立的事实和事实间的联系中得出政策性的结论。但是，对于不发达和发达国家为促进和加快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而应遵循的主要政策，书中并未给予综合性的概述。

然而我发现，在记者招待会和采访中对我提出的问题以及在许多评论中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了那本书中缺掉的第8部分，它本应包括我试图从我的研究中得出的主要政策性结论。由于我赞赏这种公众兴趣向实际问题的转变，更由于我在政策问题上已有相当明确的观点，还由于我是一个北欧人，我很乐意地回答了那些其它问题。有时候我被误解了。

我由此完全意识到，《亚洲的戏剧》常被错误地当成替不愿帮助不发达国家努力发展的行动提供论据，使西方国家的保守分子及反对派感到满意。我还发现，我的一些开明的朋友显然因为对我的论据目的有同样错误的印象，仅凭自己良好的意图而没有带着正常的关切和理解来读我的书。我有一种感觉，即我在不发达国家中倒被更好地理解。

当我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学术研究院之邀举办三次讲座，并得知将扩展成书时，我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并乘此机会补上前面的著作中缺掉的第8章。

在《亚洲的戏剧》中，我注重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关心

的仅是位于南亚的将近人类1/3的人们，包括苏联和中国以南的所有国家，从西边的巴基斯坦到东边过去的法属印度支那，并包括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①我的分析尤其着重于英属印度分裂而成的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原因不仅在于这一地区拥有巨大的人口，而且在于那里的统计和其它资料远为丰富和有条理这样一个事实。更重要的是，关于发展问题的讨论在那里进行得远为长久，层次也较高。这最后一点更具决定意义，因为研究针对的是问题，而不是在任何意义上装成一个对这一地区普遍状况的综合考察。

随着我现在转向论述从那项研究中得出的主要的政策性结论，我将首先继续考虑南亚，特别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但在这简短的书中，我对政策问题的论述必然是概括性的，它将经常与整个不发达世界相关联。

在此书中我将把我的分析限于非共产主义国家。这也许被认为是一个未具有完全良好动因的决定。不发达的共产主义国家当然也遇到许多其它不发达国家同样的问题，但在一些方面它们以一种极为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此外，发达的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国家在帮助不发达国家上的相互合作虽说是合乎情理，但尚处于起步的阶段。将共产主义国家排除在本书考虑之外的主要原因乃是出于将研究局限于可以把握的范围内的实际理由。

本书实质上是《亚洲的戏剧》的续篇，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它的导读，更主要是从政策角度对它的一个总结。我在各处将从那本书中大量引证，以便更好地对几个问题进行论述，并将之作为文中的资料来源。出于同样正当的理由，在一个个论点得到更完

^①对于本书提到的南亚和其它地区的定义，见《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的贫困的研究》（纽约：20世纪基金会和潘森图书公司，1968年），第1章，第1节，第41页。

整论述之处，我还将参考我早期的著作。本书中引用了其他作者的著作，但未列有关参考书目，在注释中提到的《亚洲的戏剧》的章节中已经列出。由于注释几乎专指《亚洲的戏剧》，希望文中许多的注释数字不使普通读者生厌，读者可将其跳过去。

这是一本“政治性”的书，因此根据我的观点，应当不仅是给专家、官员和职业政治家，而且也是给公众中有趣的人看的。所以，我的政策建议应当表现为由事实和明确表达的价值观点前提得出的合理结论。尽管对于这样的意图我并不放弃，我仍尽量让我的话直截明了。我没有顾及任何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小心谨慎，但求说得清楚率直。我愿把约翰·J·加尔布雷斯1969年夏天作为“美国民主活动会”的主席退休时说的一段话作为座右铭：

我们决心在自由政治中建立一个公正的新标准，今后它不仅关系到自尊，而且关系到准确说出我们的意欲和我们的思考的必要性。如果需要，对于那些不管在其它方面多么有资格，却向政治巧言屈服的人，对于那些我们怀疑在诺言和实际间有差距的人，我们都将反对他们。

本书的副标题听起来或许很狂妄。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强调不定冠词“A”（一项）。我完全明白这样的事实，即在后文讨论的问题上没有任何一致的意见。为使读者们记住这一点，我经常以第一人称来表述我对于事实和政策的意见。

副标题很容易让人想起美国的反贫困计划。毫无疑问，在不发达国家贫困的国际问题和美国的贫困问题之间以及这两组复杂问题进入公众意识的方式和在政策上处理的方式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首先，它们都被上升到了公众意识和我称为理智和道德净化的政治重要性的高度。

在国际领域，这种净化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巨大的

政治变化之后不久。在美国，直到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才开始醒悟到还有人生活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困境之中，醒悟到必须为此做点什么。由政府间组织的秘书机构进行的深入的统计研究既是国际领域的净化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在美国，这种净化以同样的方式由统计调查、书籍、讲演和会议推动而成。

至于国际问题，根据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建议，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宣布60年代为“发展的10年”。在美国，林顿·B·约翰逊总统早在1964年就提出“向贫困的无条件宣战”，其后又提出“伟大社会”的设想。类似动人的关于将不发达国家从贫困中解救出来的宣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是司空见惯的。

正如本书中将指出的，在这两组复杂问题之间有着极大的本质的相似性。在某种非常现实的意义上，有些美国人被从空间上、社会上和经济上同生活在舒适环境中的大多数美国人分隔开来了，因此在许多方面也有同不发达国家相似的发展问题。然而两者也有着巨大的差别，其中大部分同这样的事实有关，即在美国真正贫困的只是少数人，而在不发达国家，实际上在全世界，真正贫困的是大多数人。

另外还有一些相似之处，美国的反贫困计划从一开始考虑的眼光就太小，同所需改革的范围和激动人心的宣言很不相称。它未经筹划，而且变得空洞无物，没有很好地执行。不过，可以希望，它代表了将要到来的更大努力的开端，此后它将在综合和现实的计划框架内得到加强和更好的协调。我们的世界反贫困计划过去和现在都由于同样的缺陷在更大程度上遭受了挫折，这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本书将对此做进一步的阐述。

美国贫困方面的理智和道德净化在许多力量的影响下近年失去了势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急剧升级的卷入就是这些力量之一。战争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尤其是吸引了他们在华盛顿的统